

CULTURE AND 文化与诗学

第五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编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王一川
曹卫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OETICS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编

文化与诗学 (第五辑)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王一川
曹卫东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诗学.第五辑/童庆炳主编.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301-10238-0

I. 文… II. 童… III. ①文艺学-研究-文集②文化-研究-文集 IV. ①I0-53
②G1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0709 号

书 名:文化与诗学(第五辑)

著作责任者: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谭燕

标准书号:ISBN 7-301-10238-0/I·078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pkusws@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25 印张 266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王一川

李春青(常务)

编 委(按拼音为序)

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陈太胜(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执行)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卓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

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罗 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张 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小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周 宪(南京大学中文系)

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

Juergen Habermas(哈贝马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Michelle Yeh(奚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Richard Lynn(林理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Sheldon H. Lu(鲁晓鹏,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目 录

“文学理论的边界”讨论专辑

文学理论反思与“苏联体系”问题 钱中文(3)

文艺学边界三题 童庆炳(33)

文学会消亡吗 杜书瀛(43)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 陶东风(67)

关于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出路问题的思考 李春青(76)

文化研究还是“文化诗学”

——“童-陶之争”与文艺学学科的建设问题 赵 勇(89)

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 陆 扬(103)

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

——兼论文艺学的边界问题 吴子林(106)

批评理论:文论研究的当代策略 陈雪虎(114)

文化领导权与文学理论的重建 曹卫东(122)

诗性体裁及其文化意识的积淀

——文化与诗学中介的载体研究 邱运华(130)

宗教象征主义与苏联初期革命文学中的基督教意象 王志耕(145)

中国文学与文学观念之发生 李壮鹰(156)

解放初高校文艺学教学的转型

——1951—1952年高校文艺学教学大讨论 程正民(182)

目
录
1

作为艺术的批评

- 李健吾的新诗批评 陈太胜(208)

海外学人园地

- 旧“小说”的全球化：一个基础的问题 [美]黄宗泰(229)

别离歌

- 海曼斯、兰顿、E.B.布朗宁对弗里德里科·布洪的重释
..... [美]卡里·洛克(240)

博士论文选萃

唯“美”与“善”的意向性

- 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化 于闽梅(257)

话语分裂与文人自我的生成

- 《骑兵列传》与汪曾祺的复出 周志强(273)

创作实践对理论的提升

- 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 曹尔云(291)

- 编后记 (301)

**“文学理论的边界”
讨论专辑**

文学理论反思与“苏联体系”问题

钱中文

一 我国的文学理论经历的三次冲击

当今文学理论所引起的争论,已大大超出文学理论本身的范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达国家的“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文学的终结”,以及经济、文化全球化、一体化的理论著述和思想观点,对我们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问题涉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定位,对社会文化的定性,文学终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研究是否应为文化研究替代,科技信息、媒体中介、资本市场对文化、文学的影响,是否由于出现了物的、身体享受的快感美学,美学的精神提升一定会被替代,等等。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国内知识界是存在着分歧的。文学理论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正是这些分歧的反映。由于涉及的问题都很大,本文作者自知力有未逮,所以只能就事论事,讨论文学理论问题。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三次冲击,性质各不同。

第一次是 80 年代。先是从对庸俗社会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开始,批判它几十年里把文学变成了政治,文学评论总与政治挂上钩,不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否定了文学自身,成为一种政治意识的先锋,结果文学成了极“左”政治的工具。随后改革开放,各种外国文学理论思潮涌向我国,其中文学内在研究论的影响极大,它促使我国文学研究者在深入的反思中,强烈地要求文学回归自身,主张文学的自主性。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 90 年代初。主张文学的自主性实际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在探讨文学自主性时只求封闭于文学自身;另一种思路则将文学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形态密不可分。因此,两种

思路有关文学自主性的内涵是不同的。第一次冲击使我国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虽然就文学的认识来说,不断引起争论。

第二次冲击是 90 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十年左右时间。这一时期是我国市场经济最终确立的时期,它带来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迅速失范与崩溃,也包括审美价值的多样、变态与混乱。文学从个性化变得私人化、娱乐化了,审美欢愉被追求感官欲望与粗俗的刺激、享乐所替代,媒体与一些写作者合谋,制造、引领粗俗的文学时尚。文学淡化并失却了其社会的价值与功能,自然就走向了边缘。于是人们发现,文学批评出现了“失语”现象,随之人们发现,支持着批评话语的理论规范,对于新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基本失效。在这里,我只是指评价当代一些文学现象的理论规范,而不是像一些学者说的整个理论规范。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化研究与批评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思潮于 80 年代中期进入我国,其后于 90 年代得到广泛介绍,一些原来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有的忙着进行操演,有的进行深入研究。后现代文化批评触动并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的更新,使我们在现代性的反思中获得活力。它挑战话语权力,消解话语的僵化与垄断,张扬到处存在的差异,展示事物的丰富多彩与多方面性,并以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反对事物恒常不变的僵化的本质主义。它审视以往的文化经典,对启蒙、宏大叙事、元话语、人文精神进行置疑或消解,主张要用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学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它使用西方各种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及其探讨的问题,一反 80 年代那种躲避政治犹恐不及的做法,轻易地挤入政治话语领域,就像外国的多种流派的文化批评一样,对中外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科技、历史、文化、女权、性、图像、影视、殖民主义等问题进行评论,四处通达。虽然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在那些政治性问题的探讨方面,常常不能直达原本设置的论题本意而显得隔靴抓痒,但在政治话语权力上开始获得共享却是一大突破,再度使文学研究与政治等方面紧密地挂上了钩,以各种方式凸显论者内心储存已久的强烈的政治情愫,扩大了学术、政治的自由度,在多种学科的研究中,率先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外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与批评是必须进行介绍与评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后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上的产物,是这一时期西方所探讨的种种文化现象的思想表述。到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经过一番操演,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进入我国,一开始就显示了极为复杂的情况。从80年代开始,我国在大力扶持、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引进跨国资本,融入国际资本潮流,创造和扩展我国的资本与财富,从而跻身于全球化的经济之中。这时外国资本主义后一阶段的物质、文化现象,急速地移入或介绍进了我国,再加上媒体的长期引领和社会普遍奔向欲望的情绪,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与文化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对美国标准的追求,形成了后现代文化在中国本土的基地,出现了现代文化、前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局面。前现代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在我国虽然不断受到质疑与批判,但由于其存在的长期性且受权力的影响,所以具有极强的韧性 with 超稳定性。而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结构中,现今出现了“十个阶层”,可以说“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部分都已具备,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但这仅是一个“雏形”,“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如果调整不好,还会给现代化造成倒退。这些不同阶层,占有着不同的资源,如“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①一些人在圈地运动、外贸垄断、项目审批、变相占有国有资产、钱性权的交易中暴发;科技知识分子、学校知识分子在90年代之后,由于科教兴国、教育市场化而纷纷获益;而社会弱势群体,旧工业基地职工,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生存艰辛,甚至家徒四壁。社会贫富悬殊相当突出,两极分化也呈扩大趋势。如果不能不断地调整这个社会结构,改变经济收益上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及行为取向,要实现社会现代化也是十分困难的。

同时从全球化的语境来考察,我国虽然进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时代,但在体制与各种社会机制上,在价值创造与分配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极

^①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5页、第1章第3页。

大,要达到它们的水平,路程还相当遥远。因此虽然处于同一世界、同一个经济体系之中,但我国在经济上显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 50 年里,从科技、信息、物质方面来说,我国正在建立的是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社会,而我国现代化社会的整体建设,是否会转向现在西方社会模式和所谓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体制,还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精神文明,自应成为主导潮流与主流意识。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是面对我国现实,面对当今文明社会建设的需求,不断进行自身的反思、批判,在批判中进行更新与创新。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现代性在其过去的历史进程中,往往走向绝对理性而酿成灾难,但它毕竟是个未竟的事业。在历史、现实形态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下,我们必须对前现代的封建落后的物质、精神形态,进行不断的剖析与批判,同时对后现代文化也必须抱有分析、鉴别的态度,吸收其积极、有用的成分,排斥其盲目的解构一切价值、精神的虚无主义与极力建立自身的话语霸权的趋向。

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的表述,影响着中国的学界。比如詹姆逊认为:“中国的某些部分——城市部分——正处于迅速变成后现代的过程,尤其在后现代性意味着历史或历史感或历史性消失的那种意义上。”^①这一观点,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性,后面还会论及。外国朋友看到我国一些较发达的大城市,其蕴含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因素可能多些,比如科技网络文化、媒介文化、流行时尚、跨国资本的操作、垄断贸易等等。这些现象实际上正是我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其具有一定的后现代因素,并且也正是我国出现后现代文化的思想基础。至于大量的中小城市与农村就完全不是如此,它们是否能够快速脱离前现代阶段,超越现代阶段,或使这几个阶段合而为一,直接进入后现代阶段,我们可以这样期望,但实际如何就很难说了。这样,从整体来说,我们现阶段建设的主导思想主要是现代文化思想原则,而不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所奉行的各种思想原则。不同的阶段相互交织,不同的思想无声渗透,很难在其中划

^① 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4—105页。

一条界线。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多次企图跨过经济基础而进行经济文化的超越,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徒然暴露了乌托邦幼稚病情绪,那时反对超阶段跨越的论者,无一不受到残酷的政治批判。所以对于我国的现状来说,尽管后现代的因素不断渗透进来,包括人民大会堂西边由于中国建筑设计整体无能而要靠外国人来设计不伦不类的、大恐龙蛋式的后现代文化样品的国家大剧院,但需着重处理的恐怕还是现代化的文化任务。当然,开放地、有鉴别地吸收多种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后现代文化因素,也是建设现代文化的应有之义。

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思想系统,而是开放的、“主义”多样的、内涵复杂的文化现象,它自称包括文学理论研究在内。但文学理论有寻求现代性、科学化的文学理论,也有把种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探讨视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这在国外曾流行一时。后一种研究,在我国很难说是文学理论研究,其进行的观察与作出的评论,不是有关文学作品的探讨。文学细节和现象在它那里,不是文学批评的对象,而是一种对于社会泛文化现象的评说。它通过某个文学作品的细节,或某个文学现象,表述作者的一种对于当今政治、经济、体制、权力与权力分配、革命、民主、公民社会、女权、性别、文化制度、商业现象、消费制度、大众时尚、模特表演、科技、影视、信息、公共知识分子、某段思想史,甚至建筑设施的各种直白或是隐晦的政治文化的判断与批判。这是文化现象的研究,而不是文学现象的研究。同时也不能因为这类研究出自几位文学批评家或是文学理论家之手,就以此来认定这类研究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这类文章,社会学家、政论家、思想史家、文学史家、历史学家、性学家、女权主义者、哲学家、影评家、广告专业人员、时尚杂志编辑都在写,他们写他们研究的专业问题,要比样样在行、什么都写的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内行得多,也专门化和深入得多。自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正在开辟着自己的场地,对当今社会迅速出现的多种文化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观察,作出及时的回应。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迫切的。

在对待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方面,我国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的不同学者的立足点与态度不尽相同。一些学者积极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诸多现象,梳理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态度比较实事求是,分析、批

判了其复杂、积极的一面,于我们有用的一面,可以借鉴、吸收的一面,同时也不讳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消极的一面,不利于我们文化建设的极端虚无主义的一面。另一些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宠爱有加,一轮又一轮地追新逐后,一面大力介绍,同时全身心地融入其中,大体持有一种全盘接受、拥抱的态度,不仅接受了其积极的一面,而且也大力张扬其消极的一面,在自己的著述中积极地进行操演,并以自己的论述,提供了这类实例。除此以外,现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视而不见,或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恐怕已为数不多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进行简单的肯定与否定中,也不乏情绪化的表现^①。

文化研究与批评对于建立话语的多元性和健康的意见的自由表述是完全必要的。不能否认,我国文学理论界与批评界由于后现代文化批评思潮的输入而受到积极的影响。这自然是一种文化的冲击,表现在文学理论在不断进行现代性反思的过程中,更加意识到必须克服自身原有的单向性,朝多向性发展,即在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的同时,吸收文化批评的多向性因素。文学理论需要面向实际,探索文学理论新问题、前沿问题。而在这方面文学理论显得相当软弱无力,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一部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实践不易辨认,失却了理论上的锋芒。另一方面,文学理论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一直在不断寻找理论的自我完善。它以原有的文化研究为基础,通过传人的文化批评的影响,在方法上扩大了自己的视域,使自身在总结近 20 年来的走向的基础上,自然地归向文化诗学,即以文化为基础,面向文化的多方面性,同时又和文学学理紧密结合。90 年代我国的文学理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关于这点,我在后面还将谈及。在这一时期,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大致是和平共处的。

20 世纪末,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批评理论移植日多。人们对文化研究、批评理论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流行、实践的真实情况,也开始有所了解和介绍。在美国批评界与一些高校的英语系,自从移植了文化批评之后,就开始出现所谓逃避文学、取消文学课程的现象,文学理论自然更不值一提了。课堂上师生们

^① 参见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代话语·序》,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 页。我赞同该文作者对我国当今后现代文化状态的描述。

大谈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就算是讨论了文学理论,这显然是把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泛化为各种文化现象的教学和研究。关于这点,本文作者、盛宁先生和余虹先生的文章都有介绍。^① 世纪之交,在我国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学者就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西方社会信息科技和图像艺术的兴起,以及美国学界出现的文学终结理论和美国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衰落情况,作了一些评述与讨论。根据这一情况,我国一些学者就上述问题对照文学、文学理论的发展现状,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②,算是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但是有的学者几次提出,这类争论是由于中国学者错误地理解了外国学者的观点所致,所以对话“并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③。其实,中国学者并未错误理解外国同行的观点。米勒先生研究文学几十年,中国学者是清楚的,但他的文章常有相互矛盾、含义暧昧之处,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他近期的演说与文章,的确是传达出了图像时代文学研究难以为继的信息^④,而且这是文章的主调,接着他又说文学研究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可见确有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才有中国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最近米勒先生又说:“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⑤ 音调又有些不同了,而且“安全感”成了主调。由此看来,我们要对外国学者的话题随时跟着说,才有可能站到“同一层面上”进行对话,但这样做,确实让一些中国学者太忙活了。同时这几年来,我国的文化批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了专门刊物《文化研究》,也有了网络版的《文化研究》,一些很有实力的原来的中年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纷纷转向了文化批评与研究。目前来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队伍太大了,这和学科的设置有关,实际上可以分出很大部分的学者进行文化研究,去开辟宽阔的文化

① 参见拙文:《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② 参见拙文:《全球化语境和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童庆炳:《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与希利斯·米勒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7日。

④ 参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⑤ 《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

领域。

但最终要以泛文化批评、“后现代真经”来改造文学理论研究,从而暴露了文学理论自身潜在的深刻矛盾,酿成了对文学理论的第三次冲击和危机,则是近一两两年内的事。

这是从对文艺学这一学科的反思开始的。文艺学的现代性的反思,其实一直在进行着,并且不断在扩大自己的视野。本世纪初,有的学者指出了当今大学文学理论课程的种种弊端,并就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本质主义等问题进行论争^①。2002年《文艺研究》发表了《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和《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两文。这两篇文章,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文化研究在美国学界发生的过程与命运,但两位作者的出发点、想要说明的问题、要我们从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接受一些什么和借鉴一些什么的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2003年末,《文艺争鸣》连刊8篇文章^②,都是讨论文化研究和文艺学的关系的,除了存在少量不同意见外,文章大都认为,大学文艺学已不适应当前文化发展的需求,文艺学必须迅速越界、扩容,原因是由于当今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导致各种学科边界正在发生变化以至消失。文艺学的越界与扩容,就是要将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包含的种种文化生活现象甚至包括物质文化的设施都纳入文艺学研究,并且改变了文学理论原有的一些专门术语的内涵,

①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同类文章还有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曾庆元:《也谈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王志耕:《文学理论:走在路上》,《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田忠辉:《文学理论反思与文化诗学走向》,《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曾庆元:《再论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依据——兼答王志耕的〈文学理论:走在路上〉》,《文艺争鸣》2002年第6期。

② 这组文章有王德胜的《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金元浦的《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朱国华的《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略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条件》,魏家川的《有关身体的日常语汇的审美生活分析》,阎景娟的《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论文艺学的“划界”、“扩界”与“越界”》,黄应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泛化”》等,均载于《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提出了一些文学理论的新命题,宣告要以物的、身体的享受快感高潮的美学替代精神美学的美学新原则,找到了以泛文化、泛审美生活现象替代文学理论原来的研究对象,完成改造、更新文学理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切入口。紧接着2004年第1期的《文艺研究》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栏目下,又刊出了一组论文^①,其中有的论文重申了上述观点,有的提出了改造文学理论的新方案,有的则对近20年的我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提出了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从文化研究那里取得后现代真经的文艺学”,所以目前已是一派光昌流丽的景象。网络版的《文化研究》同时刊出了一些文章,继续发表这类讨论的文章。

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共同组织了“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研讨会”,不同意见的学者在会上互有交锋。6月中旬,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一些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就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特别是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上不同观点纷呈,意见分歧突出。6月24日和7月1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和《文艺报》刊出有关会议的报道。报道说,会上大多数学者主张文学理论应该积极回应当下现实,拓展边界,这是事实。但报道说中外学者多次指出文学“理论死了”,大多数学者同意文学理论应“向具有‘文学性’因素或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和作品开放,应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但不能对其作纯粹的审美和道德判断,而要对其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批判,进行价值干预”等,这里说的大多数,其实只是主张将泛文化批评替代文学理论的部分学者。而对此持有不同意见的有些学者则反应十分强烈:认为将泛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这是文学理论的内爆与分裂,文学理论在自己打倒自己,自己否定自己,正如美国有的大学将文化研究引入课堂后,文学课程与文学理论走向了自身的消解。

^① 其中有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陈晓明的《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等。